

闲章不闲，方寸之间多意趣

李学朴

印章融书法、绘画、雕刻于一体，是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古往今来，许多文人用印，除名章外，还有使用闲章的习惯。所谓“闲章”，通常是指以清词丽句镌刻的印章，多见于书画作品引首或押角，少则一方，多则数枚，审其布局虚实而定，每为作品平添几分艺术效果，故又称之“引首押脚章”。但这种印章无关名讳，可以随意撷取诗文或用俗语，表心迹，抒志趣，印文丰富多彩，凡具意趣，颇有兴味。

据考，闲章滥觞于先秦时期。最初的闲章，多作为吉祥之物，为书画篆刻家所重视，时以此馈赠好友。自诗文名句入印后，加上印谱的问世，更扩大了闲章的内涵情性，尽态极妍，抱含哲理。至明代后，文人墨客皆喜镌刻、铃用，蔚然成风，沿袭至今，更受书画家之青睐。

宋代书画家们将其铃盖在书画作品上以作征信，并增添美感，融书法、篆刻、金石韵味于一体，同时亦用以鉴藏。米芾曾亲自创作印章，涉及此道者还有王休等人。到了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吾丘衍、钱选、王冕等人也纷纷致力于印章创作。赵孟頫用形体娟秀、笔势圆转的小篆入印，称为赵氏“铁线篆”，与吾丘衍共创了“圆朱文”印文字体，开创了一代风气。清代陈炼《印说》评价：“其文圆转妩媚，故曰圆朱文，要丰神流动，如春花舞动，轻云出岫。”可知这一书体的美妙。赵孟頫曾辑成《印史》，刊行于世，对当时的篆刻艺术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吾丘衍与赵孟頫为忘年交，时相往还，其以“玉筋篆”入印，对当时的篆刻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赵孟頫并称“吾赵”。王冕用花乳石治印，解决了印材便于镌刻的问题。于是文人墨客中好此道者越来越多，闲章日受青睐，成为治印者的重要创作内容。

闲章中，大多是表示激励和萌志发愤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句，刻有闲章曰：“老学庵”一颗，作为书斋名，激励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齐白石有“三百名印富翁”“千石富翁”之誉，这“三百”“千石”印并非都是名号章，其中大都是“闲章”。他一生发愤苦学，成名后遂精心刻一闲章曰：“鬼神使之”，说明从事艺术创作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下笔如有神助的一种境界。其他诸如郭沫若的“惜寸阴”、李可染的“峰高无坦途”、王遐举的“壮暮”等闲章，也表达了印主的自勉自警。足见一章之微，蕴蓄之深，令人叫绝。

清代陈豫钟一生探求书画篆刻艺术，著有《求是斋印谱》《求是斋集》。其印文“求是斋”有一种独特之室，甘愿享受寂寞之感。清代书画家、篆刻家黄易流传至今的白文印章，线条刚猛劲爽，时露刀锋，痛快淋漓，有一种“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凌厉气势。这种切刀的快乐，体现了篆刻家娴熟的切刀技巧，以及对印面线条走向空间的方寸把握。全印劲道中显古拙，是书法与刀法趣味的有机结合，有黄易篆刻艺术独特的韵味。

白文印又称阴文印，印章文字或图像有凹下与凸起两种形体，凹下的通称阴文，突起通称阳文。阴文印即是印章文字或图像凹下的印章，印章铃盖出来的效果印底呈红色，文字呈白色，给人空旷、飘逸之感。

闲章不啻拓展创意，有的还用来展示其身世、经历和处境。“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一生以“风尘俗吏”为乐，后被诬而遭罢官，他自镌“真心道场”“私心有所不尽鄙陋”“畏人嫌我真”等数枚闲章，寓洁身自好、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节操于印文之中。康有为生前有枚阳文钱篆闲章，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行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寥寥数字，戊戌旧事，概见端倪。国画大师徐悲鸿在他收藏的一幅《八十七神仙卷》古画及任伯年的扇面等精品上，都铃盖上了“悲鸿生命”那方意味深长的收藏闲章，反映其对艺术追求的忘我之境。书装艺术大师钱君匋先生，八十年代初重获文革被抄文物后，自刻“君匋庚申重得”“与君一别十三年”两印，忆怀备至，其情也哀，其情亦浓。

有的闲章记录了作者的境遇情怀，借以寄托物故，以表心迹。明代书画家郑思肖的“求则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万古”白文印，意在刚介有志；吴昌硕以“一月安东令”自喻的闲章，以嘲不遇；近代文学家郁达夫精于篆刻，刻有一方自用印“郁郁乎文哉”，系选用《论语》中之句而成，巧妙而得体，优雅清丽，耐人寻味。

从闲章的印文上，还可窥见作者的禀赋与爱好，意趣盎然。明代唐寅中了解元之后，往京应试，因科场案牵连而被黜，居苏州卖画为生，常在画幅上铃有“南京解元”和“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民间因此衍出了张冠李戴的著名的《三笑姻缘》。李叔同年少目睹清政府腐败，遂立志主张维新，适逢戊戌变法，自镌“南海康君是吾师”；30岁时出家为僧，又刻了“沙门多辟目”闲章，抒发其对世事的感受。张大千去台湾后，曾画一幅《黄山旧游图》，寄怀在家的四哥张文修，铃有“别图容易”一印，并题曰：“吾哥年八十有二，弟亦六十八矣，相望不得见，奈何。”该印把海峡两岸思亲之情跃然纸上，深化了作品的意境。

闲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有的艺术瑰宝，是一束馨香四溢的奇葩。它犹如一扇窗户，让我们从中看国运民命、变迁兴衰、人世沧桑。其含蓄的深邃意蕴，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闲章不闲，是历史文化的一块丰碑。



郑板桥故居中门额题字“聊避风雨”。其实郑板桥最有名的印章，应该是“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这里的徐青藤即徐渭，字文长，号青藤，明代三大才子之一。

阅读评

《复活》：寻觅破碎的道德拼图

孙全喜



《复活》2018年浙江文艺版封面

当欢快明媚的春天顽强地来到这个“糟蹋得面目全非”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的小城的时候，省立监狱办公室正在做“神圣而重要”的事情就是审判犯人玛丝洛娃“谋财害命”。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巨著《复活》的开篇。

作为十年前诱奸并抛弃了玛丝洛娃，导致其沦落风尘的始作俑者聂赫留朵夫以贵族代表身份参加陪审。此刻的他正想入非非：是否要娶柯尔查庚的小姐玛丽娅为妻，因为他正和一个贵族妻子私通……

1.

此后，他见证了审判过程的种种腐败、黑暗，亲历了沙俄官僚制度的腐朽昏庸、冷漠敷衍，目睹了玛丝洛娃的冤案难昭、冤情难申，体验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荒唐与扭曲，他的思想和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审判厅长怕耽误和红头发瑞士姑娘的约会；一位法官因和妻子刚刚吵过架，担心回家不给他做饭；另一位法官喜欢用占卦的方式解决自己的疾病，将本来走到自己座位26步的距离，赶紧垫一步，走成能够被3整除的27步。陪审员的颓废、浑噩，讨论得昏昏欲睡时，居然疏忽了玛丝洛娃“没有损害性命的意思”。检察官的色厉内荏、慷慨陈词，挖空心思弄弄知识、装腔作势哗众取宠、有罪预定推论假设。上诉法院的形同虚设，他们坐在制度的架构上高高在上，却暮气沉沉，不愿触及矛盾深层问题，不去“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在来往的公文和法律条文中寻找判决的漏洞，对事实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大法官、上诉委员会委员、官办教会负责人等几个有势力的人物回避矛盾、例行公事，“这些官吏、各部会的办公桌前面坐着的那些漂亮、干净、庄重、自以为了不起的大人先生们，虽然明明看见这种局面使得无辜的人受害，却一点也不介意，所关心的只不过是镇压和法除所有的危险分子罢了”。所有这一切丑恶，导致既没谋财也未害命的玛丝洛娃最终被判发送西伯利亚服役刑4年。

“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而这一切的过错，是他一手所酿成，命运却让他坐在陪审团的位置上，让他来审判他的罪。此后，聂赫留朵夫毅然抛开自己优越的生活环境，放弃大部分土地给农民，在追随玛丝洛娃服刑中得到了灵魂救赎和精神复活。

其实，“复活”的含义很广。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改朝换代，种子的飘落尘埃、发芽重生，自然界及其四季的更替轮回，体现的是发展进步、弃旧图新。《圣经》耶稣的“复活”，不仅寓指物质肉体的复活，更在于灵魂“战胜了死亡”；作为统摄全部佛法的

《摩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强调的是五蕴皆空，心无挂碍，超越生死，到达彼岸的涅槃。作为无神论者，只需认识到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宗教追求，其实蕴含着生命万物的吐故纳新。

“万物消失，万物复归；万物死亡，万物复兴；万物碎裂，万物复合。存在之轮永远循环。”尼采带有神秘色彩地称之为“同一者的永恒轮回”；恩格斯着眼于物质运动形式和物质属性的不灭，同时受制于物质运动规律而称之为“同一者在大循环中的永恒重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认为“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连续更替”。恩格斯坚定这样的信念：“地球上最美的花朵——人类——尽管必然毁灭，但在永恒的循环中必然重生。”

2.

作为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复活重生、救赎新生，不是物质上的轮回更替，也不是对死亡的超度，强调的是颠覆旧我、自我革新、精神超越，体现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不断进步趋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重生。中国传统非常重视自省修身立德，主张见贤思齐，闻过则喜，见不贤则内自省，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易经》益卦指出风雷激

荡，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精神重生。《礼记·大学》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马克思一生致力于人的全面解放研究，他在《资本论》中提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将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而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摆脱物质奴役、不断促进自我进步和自我超越的过程。“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一次次的失去，一次次的获得，显示了辩证法的哲理。大浪淘沙，水滴石穿，其实是一代又一代的精神传承。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对精神或灵魂问题进行了深刻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从“一个罪犯的忏悔”里，发出了关于人能不能犯罪的灵魂拷问，得出“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的“复活”结论。《罪与罚》中索尼娅虽为妓女，却引导拉斯柯尔尼科夫站起来说：“我并非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所有苦难下跪。”他突然想起索尼娅的话：“到十字街头去，向人们跪下磕头，吻土地，因为你对它也犯了罪，大声地告诉所有人：我是凶手！”“想起这些话，他不觉浑身

哆嗦起来，在强烈的束手无策的苦闷和惊慌不安中，紧紧抓住这个涌现出来那纯洁的从未有过的和丰满的感情机会。这种感情和疾病发作一样，在他心里骤然涌现出来：像星火一样燃烧，像火一样烧遍全身。他一下子浑身瘫在了，泪如泉涌，他立即在地上伏倒了。”

托尔斯泰的文笔洒脱超然、镇静稳健。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震撼紧张、深刻凝重，乃至有一种充满暴力和歇斯底里气质，这无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从刑场上拉回来，几乎被枪决的致命经历有关。那种生死场始终压在灵魂上的重负，给予了他持续的震颤体验。因癫痫症及其带来的时而狂喜、时而大悲的精神体验，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有一种天人交战般的内心焦灼感。

《复活》中妓女玛丝洛娃，《罪与罚》中妓女索尼娅，最卑微的人，颇具象征性地代表至高无上的圣洁与救赎，她们身上闪现着不可磨灭的人性光芒，犹如但丁的永恒之神——恋人贝雅特丽齐，在《神曲》中引导但丁遍历9层天堂，实现了但丁的自我救赎。她们像一面镜子，照出人性中的卑劣。唐朝李复言《续玄怪录》记载的“延州妇”，后演化为各种剧本至民国杂剧《马郎妇化金沙滩》的金沙滩头马郎妇，也演绎出超度苦海、舍生而取义的出污泥莲花形象，正如马郎妇唱道：“俺常准备着肉肠伺候喂鹰，走长街吆喝着看买灵魂，俺这一副皮囊，裹的是艳骨，赚来的是魂灵，抛下的是万人坑。”

而托尔斯泰认为：“我要过人的生活。”真正的人是永远根据自己的良知做事，时时刻刻进行自我反省，以避免自己掉入堕落的深渊，即使曾经有过可鄙的生活，浑身罪孽深重，只要敢于呼唤自己心中的上帝，勇敢面对以前和以后所有的时光，让“精神的人”永远站在“兽性的人”之上，那么就能拯救自己。

3.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沙俄制度下的那种精神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完善，《复活》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与纠结。托尔斯泰主张依靠宗教在道德上获得新生，幻想在一个恶的环境中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来达到自我解放。尽管托尔斯泰对俄国统治制度的合理性进行了一定揭露：“法院唯一的宗旨就是维持社会现状，因此他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处决那些品德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罪犯人。”但他的改良思想认为“不应该摧毁整个大厦，只要把这个美丽、坚固、雄伟，为他们所热爱的古老大厦内的房间作一次重新分配就行了。”他希望通过福音书里的饶恕罪人、帮助仇敌、教人从善的教

义，感动统治者，改造社会。对此，列宁深刻指出：托尔斯泰“在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但同时，他是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颓唐”而“歇斯底里的”。

真正的精神“复活”需要三要素：制度确立、制度自信、制度执行是“复活”的制度基础；摆脱物质奴役，成为“有个性的人”是“复活”物质基础；不断寻求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进步是“复活”的内在基础。制度基础是关键，物质基础是保障，内在基础是根本。正如孟德斯鸠指出的：“在一个机制良好的国度里，恶劣的行径始终含有某种公共美德的成分，在一个腐败的共和国里所看到的美德，往往包含某些腐败的成分。”

扁鹊过虢国，闻其太子死，扁鹊针刺死而复生。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我并不能使死去的人复生，其实病人并没有死，我不过让他恢复健康罢了。切中要害的“针刺”，可以使一个人、一个社群、甚至一个国家获得复生的动力，脱胎换骨。而一次审判，是对聂赫留朵夫如行尸走肉般人生的“针刺”。

清代戏曲家沈起凤说：“世演《牡丹亭》一日，汤（显祖）在地下受苦一日。”西方艺术节也有类似的说法，“世上纪念莎翁生辰之日，地狱中的莎翁正在受罪”。呕心沥血之作，往往是作者沉浸在文字中一次次经历苦难的结果。作为批判的文学作品，读一次《复活》，托翁受难一次，我们自赎一次。



《复活》1963年版插图

书评

坐骑逃逸与自甘冒险

——趣说西游之十五

睢晓鹏

佛祖所要寻找的取经人，是“苦历千山，询经万水”的善信，这千山万水之苦，当然不只是路途之苦，还包括观音菩萨循佛门九九归真规则提前设计的八十一难。这既是唐僧西天取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佛祖取经的前提。

如果对《西游记》妖精来源进行分类，神仙菩萨逃逸的坐骑可谓其重要来源之一。第五十一回中的独角兕大王，是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因看牛的童子偷吃了“七返火丹”沉睡不醒，趁机下凡；第六十八回中朱紫国的赛太岁，是观音菩萨的坐骑金毛犼，因牧童打盹，疏于防守，咬断铁索出逃；第七十八回中比丘国的国丈，是南极老人星的坐骑白鹿所变，趁寿星跟东华帝君下棋，偷逃下界……

这些神仙菩萨的坐骑，也是神仙菩萨饲养的动物，他们趁神仙菩萨失于管教，偷逃下界，占地为妖，为祸一方，神仙菩萨是否要对他们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呢？

民法典第1249条规定：“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逃逸动物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一是逃逸的动物有侵害他人的行为，二是有损害后果，三是侵害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

关系。对比上述构成要件，不难发现，这些走失的坐骑或是把唐僧绑于洞中，或是将唐僧吊于梁下，或是命令小妖们将唐僧严加看管，洗刷干净，还吆三喝四地讨论蒸着好吃还是煮着好吃，不但对唐僧的肉体造成了侵害，还对唐僧的精神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因此构成侵权。

逃逸的动物在逃逸期间对他人造成的损失，法律采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即只要这些逃逸的动物在逃逸期间对他人造成损害，动物的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或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无过错责任对于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来说是不是过于苛刻了？其实不然。

首先，无过错责任实际上也是建立在过错责任的基础上的。逃逸的动物是一种危险，在《西游记》里，神仙菩萨逃逸的坐骑更是如此，而将这种危险带到现实中的，是动物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动物的

逃逸，与饲养人或管理人疏于管理有关，因此饲养人或管理人主观上对动物逃逸是有过错的。动物逃逸后再致人损害，即使此时饲养人或管理人对此无过错，也须承担侵权责任。

其次，逃逸动物致害的无过错归责原则有利于减少此类侵权行为的发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将逃逸动物致害责任设定为无过错责任，动物的饲养人和管理人就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去管理动物，以这会大大减少动物逃逸的可能性，从而减少此类侵权行为；倘若设定为过错责任，则因为动物逃逸在外，饲养人和管理人的主观过错很难确定，因此大概率会让受害人承担责任，而受害人并无可减少这种行为的措施。

所以，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说，神仙菩萨疏于管理，导致他们的坐骑逃逸，对唐僧的身心造成了伤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且慢。对走失坐骑的神仙菩萨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还应该

放在《西游记》的语境中去分析。

古罗马法谚云“对自愿者不构成伤害”。这句法谚现在已经演进为一项实际法规则，即自甘冒险规则，对自甘冒险者，排除侵权责任适用。我国民法典第1176条第一款规定了自甘冒险规则，该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该条将自甘冒险限定在文体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文体活动具有典型性，另一方面立法者也害怕自甘冒险会被滥用至一些非法行为（比如打黑拳）。对于合法活动中自甘冒险规则适用的范围，司法实践应该会逐渐使之类型化和丰富化。至少对不违法活动中的自甘冒险，可以参考上述规则适用。

唐僧的行为是否符合自甘冒险规则呢？这得从小说的描述中寻找答案。观音化金蝉一节中，观音

菩萨的简帖写得明白：“礼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程途十万八千里，大乘进殷勤。此经回上国，能超鬼出群。若有肯去者，求正果金身。”

正果金身是奖赏，十万八千里是征程，西方的妙文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作为资深的佛教徒，唐僧不可能不知道佛教中“朝圣”的含义。

事实上，唐僧领唐王旨意后，唐僧本寺众僧有的说路多虎豹，有的说峻岭陡崖难度，有的说毒魔恶怪难降。唐僧不为所动，曰：“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设下洪誓大愿，不由我在此生心。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可见，唐僧已经预见到此去西天，路上磨难重重，但仍自愿参与到这项充满种种风险的活动中来。

而且，我们知道，佛祖所要寻找的取经人，是“苦历千山，询经万水”的善信，这千山万水之苦，当然不只是路途之苦，还包括观音菩萨循佛门九九归真规则提前设计的八十一难，神仙菩萨逃逸的坐骑幻化为妖加以考验，只不过是这八十一难中一部分。这既是唐僧西天取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佛祖取经的前提，唐僧发愿西去灵山天雷音寺取经，也就意味着他自愿承担取经途中的一切风险。所以，唐僧既然自甘冒险，当然也就不能要求神仙菩萨承担侵权责任。